

学习与求是

马
仲
杨

红

旗出版社

学习与求是

马 仲 扬

红旗出版社

封面设计：叶 然

学 习 与 求 是

马 仲 扬

*

红 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 米 32 开 本 $8\frac{3}{8}$ 印 张 179,100 字

1982 年 8 月 第 1 版 1982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28,500 册

书 号 3160·006 定 价 0.65 元

前 言

“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十年内乱，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干部，确实怀着激情感到从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有多少积压了多年的话需要倾吐，有多少问题需要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重申，拨乱反正成了我们的历史任务，无论干部和群众都提出很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这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达，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留下来的印记。

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事情不断地发展，认识也随着变化。走过来的路总比原来的预想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这一点，回头来看，才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经常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是这个意思。观察形势，考察历史，总不能随心所欲，总应当遵照客观历史的发展。

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他还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1—432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偏离了这个原则，便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收入这本文集的，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写的一些

文章。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也有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这次编选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取名为《学习与求是》，并不是其中的篇名，而是这些文章的写作，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反映了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这些看法和认识，是在学习和探索中提出的，不妥当、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马 仲 扬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一

伟大的战略转变·····	1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14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33
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	46

二

评“三论”·····	57
真理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实事求是·····	70
共产党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	93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104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14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125

三

康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	131
什么是康生的“社会主义”？·····	161
康生的“发展”论与现代迷信·····	180

四

“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191
这是哪一家的哲学? ·····	215
评“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221
现代迷信和封建迷信·····	247
反人民者必亡·····	253

伟大的战略转变

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它不仅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也要相应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管理方式，以及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凡是不适应这场革命的东西，都需要加以改变。

为了适应这场伟大的革命，当揭批林彪、“四人帮”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出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党的主要精力，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只要不发生外敌入侵，就要贯彻始终，把新长征进行到底。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是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标志着过去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和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开始。因此，它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历史的经验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提供过这一转变的范例。

一九二〇年底，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取得了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个关键时刻，列宁向全党全国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要从战争状态转向和平建设，转向恢复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列宁在一些重要的讲话、报告和著作中，精辟地论述了这个转变的重要意义，并一再教育共产党员，学会管理俄国，学会经济工作，要钻研科学，精通业务。反对那种说空话而不务实际的恶习，反对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俄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形成了决议。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就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实行新经济政策，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建设。实践证明，俄国共产党的这个转变，促进了整个经济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对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同俄国共产党极其相似的工作重心转变。在一九四九年，当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了二十二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著作中，向共产党员，向领导干部，进行过怎样迎接这个转变的反复教

导。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同志说：“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新的形势面前，要适应新的情况，学会新的本领。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作各种复杂的斗争。不然，就不能维持我们的政权，就在城市站不住脚，就会遭到失败。他提醒全党：“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针对着我们党当时的干部队伍的状况，针对着我们干部队伍长期在农村形成的活动方式和工作习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重新学习的任务。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变成了全党的行动纲领。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对干部，进行了普遍的入城教育。这是一场生动的学习运动，也是一堂有效的动员。它使全党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端正了对转变的态度，为我们党的入城后的工作，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我们接管了城市，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但是，新的战斗也就从这里开始。重重的困难，考验了我们党，锻炼了我们的干部。我们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长期波动的物价。镇压了专门从事破坏和捣乱

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了革命秩序和被多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同时，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进入城市以后的几年中，全党上下一条心，认真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和提高，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段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转变的极其宝贵的经验。这是值得重新学习和借鉴的。

人 民 的 愿 望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新课题呢？不是的。这是我们党二十多年来，不断提出的，却一再被干扰、被破坏，至今没有实现的老课题。让我们重温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3页）周恩来同志在同一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看到有的同志肯于钻研，有了一点内行的味道，毛泽东同志称赞说：“这是极大的好事”。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他进行教育，要他们都成为内行，并一再叮嘱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要发奋努力，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真正学懂，要真正学通，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在一九五六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的许多重要报告中，一再地、反复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问题。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告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多年来愿望的集中反映。同时，他们还一再提出过党的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

革命上来。号召全国人民进行一场向自然开战的新的战争，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党的长期愿望，也表达了我国人民的长期愿望。

可是，这个愿望，却长期没有实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走了一段非常曲折的路程。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确实显示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我们党公布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可惜，群众的那种历史主动精神，没有保持多久，就遭到了破坏。苏联毁约并撤退专家，加上自然灾害，分散了我们党的精力，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给我们带来了严重损害。随着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各条战线，都得到了令人喜悦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经历了一段从高潮到低潮，又从低潮到高潮的崎岖道路。在十年动乱中，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林彪、“四人帮”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对我们进行了空前的破坏和捣乱。如果说蒋介石把旧中国拖到了绝境，那末，林彪、“四人帮”则把新中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从高潮又走向更低潮。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又一段崎岖道路。

挫折和痛苦教训了中国人民，使我们学到了识别政治骗子的本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为中国人民所粉碎，这就扫除了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中国的天空晴朗起来。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无论从物质方面和精神

方面看，还是从国内和国际看，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实现党和人民长期愿望的时期到来了。

最好的政治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那么政治工作如何摆呢？政治同经济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政治工作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事事处处都要“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他们横行的年代里，“突出政治”已成了人们的精神负担，也是革命干部大难临头的信号。因为林彪、“四人帮”的言论和行动竟成了“突出政治”的标准，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和命令，要人们“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规定对他们的命令要“闻风而动”，要“雷厉风行”！人们稍有迟疑便扣上了“不跟”、“不忠”的帽子，于是那些善于捏造“罪证”、善于诬陷好人的恶棍和骗子，成了他们得心应手的骨干分子。谁实事求是，谁就“立场不稳”。谁“左”的出奇，谁就是“高举”和“紧跟”。这就是他们“突出政治”的真正标志。无怪乎“四人帮”拼命推崇那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专门迫害革命干部的专家康生，是什么唯一的“理论家”！他的确是一个专门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恶棍、阴谋理论家。什么“唯生产力论”呀，什么提倡发展生产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呀，什么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呀，把林彪写入党章是“突出的特色”呀！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和制造冤狱的能手，什么凭着他的“感觉”和“印象”，

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坏人”呀，明明是他干的，他却倒打一耙说“背着我”呀，是“我亲自揭发的”呀。等等，等等。在为林彪、“四人帮”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方面，他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把这样的阴谋家和这样的肮脏勾当，硬同我们党和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真是天大的诬蔑。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无产阶级政治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政治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一九二〇年底，在苏维埃俄国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说过：“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人民的事，无产阶级的事，就没有经济吗？有脱离了经济的政治吗？说空话，唱高调，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吗？所以列宁指出：“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重视这个重大的转变，列宁要人们注意：“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列宁选集》第4卷第397页）看！列宁在这里把什么是政治和如何理解政治论述

得多么生动，多么具体啊！

有的同志提出，怎样理解政治挂帅，怎样理解政治同经济的关系呢？这本来是很明确的问题。可是这些年来“四人帮”把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颠倒过来。似乎一提到政治就是脱离群众的大叫大喊，大轰大嗡，不顾客观规律地制造人为的紧张，弄得人人自危。这不是共产党的政治，而是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愚弄群众的政治欺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就是要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走向邪路。列宁所说的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也是这个意思。统帅不是没有大军的元帅，政治不是脱离经济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既是统帅又要服务，统帅和服务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就象我们党领导人民又为人民服务一样是统一的。那种认为统帅高不可攀、服务微不足道的观点，是庸人的观点，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必须弄清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我们的目的，政治是前提和手段。不能搞无目的的政治，也不能搞停止生产、破坏经济的群众运动。不然，岂不变成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不算什么”了吗？因此，当前全党全国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地摆脱贫穷落后，把一穷二白的帽子甩掉。谁能说进行这场伟大的革命不是政治呢？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好的政治。

关键是善于学习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条崭新的路，也是一条陌生的路。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新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不适应，不熟悉，不习惯，不认识。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面临的考验。

新的转变，要求人们作好精神准备。

一九二七年底，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到新的转折点时，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敲起了警钟。他形象而又严肃地说：“同志们，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8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在我们这里，林彪、“四人帮”遗留下来的祸害，不是作为习惯势力还存在吗？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想人民疾苦，不听下边呼声的官僚主义者，不是仍然我行我素吗？那种说空话、不办事，推托应付，不讲求工作效率的衙门作风，不是到处都有吗？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客观规律，只按主观愿望，只按“长官意志”办事的现象，不是相当普遍吗？有些人不是抱着自己认定的“本本”照抄照搬，甘当“收发员”吗？不是也有人以“不点头，不摇头，十多年来不低头”的混世哲学来保持自己的特色吗？这些思想，这些作风，这些习气，能同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容吗？抱着这